

“找寻真正的孔夫子” ——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的儒学研究之路

许 雁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在俄罗斯汉学界,列·谢·贝列罗莫夫的儒学研究成果斐然,出版了多部儒学方面的专著以及俄罗斯汉学史上首部《论语》科学性全译本,被誉为“莫斯科的孔夫子”。本文将贝列罗莫夫的儒学研究分为起步期、繁荣期及成熟期 3 个阶段并分析各阶段贝氏“找寻真正的孔夫子”的学术历程,重点以繁荣期的代表作为研究文本,全面呈现俄罗斯儒学大师的学术之路。

关键词:贝列罗莫夫;儒学;孔子;《论语》俄译本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列奥纳德·谢尔盖耶维奇·贝列罗莫夫¹(Л. С. Переломов)(1928—2018)汉语名为嵇辽拉(Цзи Лера),出生于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父亲为中国人,名为嵇直,原为远东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师,掌握中文、英文和俄文 3 门语言。母亲为俄罗斯人,据贝氏所言,其母是其父的俄语启蒙老师。贝氏出生后随母亲姓——贝列罗莫夫,并在俄罗斯接受教育。贝氏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显现出对研究中国的兴趣。战争迫使他暂时搁置了梦想,1943 年他成为莫斯科炮兵专门学校中等军事学校学生,中学毕业后仍保持着对研究中国问题的热情,并于 1946 年考入莫斯科东方学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1946—1951 年间贝氏在该机构学习古汉语知识,潜心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及法家思想,接受基础的汉学教育。1954 年,贝氏以《秦帝国之建立和崩溃(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7 年)》(«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крах империи Цинь (221—207 гг. до н. э.)»)获得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后又于 1970 年以论秦朝古代问题为主题的论文《法家学说与中国中央集权国家之形成的问题(公元前 5—公元前 3 世纪)》(«Легизм и проблема станов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Китае (V—III вв. до н. э.)»)获得博士学位。此后,贝氏的研究重心转到儒家学说,其学术生涯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孔子生平与学说的研究,因贝氏与孔夫子一样有“好古”“述古”的学术风范,故被誉为“莫斯科的孔夫子”。

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曾说过:“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①目录学与藏书。②实物的收集。③与中国学者的接近。”(张西平 2017: 200)目前,中国学术界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文献学是治中国学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认真梳理出贝氏儒学研究各历程中的文献是我们全面把握其汉学成就的一个基本点。本文将以贝氏儒学研究的历程为主线,梳理贝氏在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及研究策略,以期还原俄罗斯儒学大师“找寻真正的孔夫子”的学术历程。

2 起步期：与儒学的初期接触（20 世纪 60—80 年代）

贝氏的学术之路起步于历史学，其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1962 年，贝氏出版专著《秦帝国——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Империя Цинь—первое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221—202 гг. до н. э.)》），该书为俄罗斯汉学史乃至西方汉学史上首部综合性研究秦朝的科研成果。（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2009：10）书中重现了历史转折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完整图景：古代中国统一的先决条件、历史背景以及中国社会体制等问题。同时，贝氏运用商鞅在公元前 4 世纪中叶进行的变法改革来解释秦国军事战争的胜利，并指出在公元前 4 世纪中叶的秦国，法家思想实质上是官方的政治—伦理学派。贝氏以法家为切入点，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政治传统的研究。完成秦朝研究之后，贝氏转向了与之相关的课题——法家学说，于 1968 年出版了《商君书》（《Книга правителя области Шан (Шан цзюньшу)》）的俄译本。据统计，截至 2009 年该译本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法家思想的俄语全译本。（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2009：11）书中包括细致的注释和前期丰厚的文献研究，并对法家重要理论家商鞅的治国理念与活动进行分析。

以上 2 部专著是贝氏学术生涯中第一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古代历史（秦汉史）和法家学说，该阶段为贝氏后期的孔子生活年代的社会背景研究及典籍翻译工作做了一定的铺垫。自 1971 年贝氏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开始了学术生命的新起点。苏联科学院远东所成立“中国政治传统研究室”，贝氏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该科室组建的目的是了解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从此，贝氏首要关注的对象就是孔子及儒家思想。

贝氏与儒学的初期接触体现在 1981 年的专著《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и легиз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此时贝氏敏锐地察觉到，法家学说进入儒家学派系统中的趋势，故在进一步研究法家学说的基础上，涉及到另一政治伦理学派——儒学的研究。该书以儒家和法家两门政治伦理学派为例，研究自公元前 6 世纪—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政治历史，并将研究重心定位于 2 大历史阶段：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与 20 世纪 70—80 年代。第一阶段共 8 章内容，主要分析古代中国的儒家和法家，其中包括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现状、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孔子学说、法家学说奠基人——商鞅、公元前 6—公元前 3 世纪儒家与法家的对外政治观、法家学说及商鞅改革对中国古代国家的影响、秦朝（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7 年）、法家与儒家在汉代的融合及其在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作用；第二阶段共 3 章内容，探讨 20 世纪 70—80 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儒家和法家，包括 1972—1976 年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两大政治伦理学派的情况以及 1976—1980 年间儒家和法家的命运。1966—1976 年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中国学界的一场冲击，（忻剑飞 2013：340）贝氏在书中展现了两家基本政治学说在中国动荡时期相互作用的复杂、矛盾进程：当时国家内部时而表现出两家学说的对抗性，时而突显其迫不得已的结合，同时也说明了儒家和法家在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该著本是贝氏的一个科研课题，1981 年他以这个题目命名了自己的新作，当时这本著作是俄罗斯国内汉学界的“流行趋势”，几乎所有汉学专业人士在大学时都读过这本书。该著为贝氏儒学研究起步期的一次重要尝试。

3 繁荣期：“翻译+汉学”研究策略的产物（20 世纪 90 年代）

贝氏生平第二个集中研究中国儒学的时期是 20 世纪 90 年代，这段期间也是贝氏儒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版涌现的时期。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儒学的研究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短暂的低潮与沉寂之后，于 20 世纪 90 年代重现了“学孔高潮”，对此贝氏写道：“近年来²，世界上出现了研究孔子学说的第二次热潮。第一次是在 17—18 世纪，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精神生活倍感兴趣。宣传神圣的专制制度及对卢梭提出的艺术和科学腐化精神概念产生质疑，伏尔泰去孔子学说中寻求证据。”（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2：3）而第二次“学

孔高潮”的原因可归纳为：世界“急于从孔子学说中找到医治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生活节奏急速加快下的社会危机的药方”。（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2: 342）贝氏此阶段的儒学研究成果在上述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下文中我们按照其成果出版顺序进行逐一梳理。

其一是贝氏对儒学的初步解读——1992 年的作品《孔子言论》（«Слово Конфуция»）。该书既是传记，又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包括 5 部分内容：孔子生平、孔子人性论、孔子社会观、国家观以及孔子格言的详解。该著中贝氏认为孔子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与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是等同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宗教的领袖“是神赋予最高力量的传播者。他们的话是神的话语。而孔夫子自己却创造语言——一个世俗人的语言”。（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2: 3）由此贝氏产生了对至圣先师孔子人性的研究兴趣，他想弄清楚为何一位世间的师者可以对全民族性格的形成及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产生巨大影响。自此，贝氏正式开启了“找寻真正的孔夫子”之路。首先引起贝氏关注的是孔子的人性论。在贝氏看来，人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人性本质的变化决定社会的发展，当无条件追求经济利益时，人性就会贬低，“意识和文化实质上是经济的命脉”。（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2: 5）探讨孔子人性论的过程中，贝氏运用跨文化类比的方法引领读者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中，使俄罗斯读者更容易接受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孔子及其学说。他提出有关人性本质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古代东方学者也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西方文化中神是至高无上的，是完美人性的代表，而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完美的人性特点赋予了“君子”，“君子”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于是贝氏便围绕“君子”形象对孔子的人性论展开研究。在分析君子形象内部特点的基础上，贝氏将儒家核心文化词“仁”“文”“和”等概念贯穿到“君子”形象的分析中，再到对比“君子”“小人”“中人”的形象，最后升华到传统的意义为继承人性的正面因素。他认为，对孔子人性论的再加工才是研读《论语》最终的目的。该著不仅呈现了贝氏对孔子学说的解读，而且提供了贝氏对《论语》若干章节的译文。至此，贝氏汉学研究的策略已显现出来，即重视翻译活动前期的研究工作。作为兼备汉学家身份的译者，贝氏深刻意识到只有对原作深耕细作之后方能把握原文底蕴，这也是汉学家译者与普通译者的不同之处。该作品是支撑 1998 年《论语》俄译本的关键理论基础。

其二是贝氏对孔子学说的深入阐释——1993 年的作品《孔子：生平、学说、命运》（«Конфуций: жизнь, учение, судьба»）。该书从多层面、多角度研究孔子的生平和学说，分析儒学经典《论语》中的关键语录，是贝氏几十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在该书中贝氏在批判性分析原典的基础上，利用丰富的中国注疏文献，探讨了孔子及其学说对古今中国的精神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赵春梅 2007: 143）是迄今为止俄国研究孔子最为详尽的专著。在该书的代结束语中贝氏阐明了自己为何没有在学术生涯初期涉足儒学研究的原因，他写道，“尽管后来我成为了汉学家，但是很多年我都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我担心接近孔夫子的学说——因为它太伟大了，需要更多的能力和知识水平。所以，一开始我在孔子学说的外围进行研究，于 1962 及 1968 年出版了两本书，主要是关于孔子的两位反对者：秦始皇和商鞅”。（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3: 406）贝氏同时阐发了自己潜心研究儒学的初衷，“近 20 年来，我总是有一种感触，觉得不知为何，对于读者我没有完成应尽的责任”，（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3: 406）并坦言：“这是由我的出身决定的”。（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3: 406）贝氏认为，出生于中俄联姻的家庭，总要为两国人民做出些贡献，而在俄罗斯传播中国儒家文化是最好的途径。

此外，贝氏在该著中单设一章为《谈〈论语〉及其俄译存在的问题》。在总结俄罗斯汉学界《论语》翻译现状时，贝氏指出，为顺应加强中俄深入了解的需要，俄罗斯汉学界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论语》译本，但水平参差不齐。把科学研究与通俗阐述结合较好的译本是 2001 年马尔德诺夫（А. С. Мартынов）出版于圣彼得堡的《论语》（«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Луньюй»）译本上下卷，其中上卷是翻译前期的研究工作，包括孔子生平及学说的梳理、儒学的概括，

作者将儒学视为一种历史、哲学、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谢缅年科（И. И. Семенов）的《论语》（«Афоризмы Конфуция»）译本也几经再版（1987，1994，1995），其中1987年的译本中涵盖了有关《论语》思想内容、复杂的文化概念及历史语境的研究。必须提到的还有俄罗斯汉学界哲学家们的成果，他们将对《四书》的翻译与哲学分析结合起来，例如，卢基扬诺夫（А. Е. Лукьянов）的《论语》译本中结合了对早期儒家哲学思想演变、儒家之“道”的结构与功能、“君子”的哲学特性等方面的分析。而对于如何完善《论语》俄译工作，我们将贝氏的建议归纳为3点：第一，翻译《论语》要结合历史、哲学研究；第二，《论语》俄译本需搭建开放式的解读平台；第三，《论语》俄译本需关注儒学核心文化词的多义性。贝氏对《论语》俄译存在问题的分析为1998年出版的俄罗斯汉学界首部《论语》科学性全译本做了坚实的铺垫。

贝氏的《论语》译本是其孔子研究与《论语》译文的深度融合，可谓是“翻译+汉学”研究模式的学术结晶。典籍翻译与文学作品翻译不同，除深厚的古汉语文言功底外，典籍翻译还要求译者具备中国文学、哲学和历史等跨学科知识。为求达到将典籍中的传统文化与精神实质最大限度准确译出的效果，陈吉荣教授在文章《论“翻译+汉学”研究格局的渊源、内涵与影响因素》（2018）中明确表示：“中外学者都非常关注‘翻译+汉学’的研究格局。翻译过程中生发汉学研究观点或者借鉴翻译成果进行汉学研究，这两种主要的方式促进了翻译学与汉学之间的学科互动。”（陈吉荣 2018：8）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典籍翻译建立了新的研究视角，即“翻译+汉学”的研究模式。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也有过类似的见解，他曾就汉学研究方法论强调，要把汉语文字通过翻译、研究、综合分析之后最终变成汉学家的思想，他将此称之为汉学家应遵循的汉学研究方法。关于《论语》的完美译本，阿列克谢耶夫曾表示“只有在确定了儒家文化词的准确翻译并从整体上（而非该书的某一部分）明确其思想特点后才可能出现。”（玛玛耶娃 2018：237）贝氏传承了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理念，同时也是数百年俄罗斯汉学的优良传统，运用“翻译+汉学”研究模式于1998年出版了《孔夫子·论语》（«Конфуций: Лунь юй»），该著作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部《论语》科学性全译本，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汉学”：对孔夫子生平的梳理及孔子学说的剖析。贝氏在研究中阐述了孔子从古至今对“儒家文化圈”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各民族精神文化、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书中贝氏以多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社会经济、政治建设及孔子生平为基础，同时借鉴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杰出文献学家的研究成果，尝试重新解读《论语》原典的思想内涵。第二部分是“翻译”，为《论语》俄译内容。译文中贝氏尝试利用副文本积极解决上文提及的典籍俄译存在问题，例如，在《论语》开篇第一章贝氏参考了杨树达、钱穆、杨伯峻等中国学者的注释，同时也考察了欧洲代表性《论语》译者理雅各、韦利、莫尔斯以及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谢缅年科、马良文（В. В. Малявин）的译文，并凭借自己多年从事儒家思想研究所得的认知对译文进行评说，指出了其中若干不妥之处，（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8：290—295）为《论语》俄译本搭建了开放式的解读平台。贝氏儒学研究的繁荣期凝结了其最突出的科研成就，即将“翻译+汉学”模式有机地运用到孔子学说研究及《论语》俄译工作，凸显了科学性译本的特点——在译本中应纳入大量孔子学说的注解。（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93：183）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年《论语》俄译本出版之际，贝氏已有70岁高龄，这位古稀之年的汉学家自接触儒学以来，潜心钻研孔子学说，认真解读《论语》中的每一个字，一步一个脚印地“找寻真正的孔夫子”，可谓是俄罗斯汉学界儒学研究的一块丰碑。贝氏作为20世纪俄罗斯汉学界的儒学大师，作为典籍俄译的实践者，在整个俄罗斯汉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1999年，贝氏将这本《论语》全译本献给孔子诞辰2550周年，叶利钦授予他“最杰出科学活动家”金质奖章。

4 成熟期：重视孔子学说的现代意义（21世纪初）

21 世纪初，贝氏仍然保持着对儒学研究的学术热情，并将其儒学研究推向另一个高潮——重视孔子学说的现代意义。

贝氏对儒学的现代阐释主要体现在他 2007 年出版的《儒学和当代中国的方针》（《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НР》）一书中。就该著，贝氏曾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它是应俄罗斯国家杜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防部副部长、现国立莫斯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国际政治系主任克科申（А.А. Кокошин）的邀请为该系师生及俄罗斯知识界、理论工作者写的一本教科书。（С.Л. 佩列罗莫夫 2009：495）此时，贝氏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谙熟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教师。书中贝氏旨在帮助读者了解异国文明，熟悉邻邦中国的经典作品，尝试解释儒家兴起的原因，也帮助读者感受文中所提及问题的重要性，理解国家建设过程中儒家的参与程度。此外，本书还向读者解密，为何 20 世纪的改革先锋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把本国的资本主义称作儒家模式，而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大相径庭。贝氏以 1972—1976 年间在中国兴起的大规模“批林批孔”运动作为具体事例，展示儒家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事件中的参与程度，同时解释了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从“反孔”到“尊孔”，这条政策作为有效的传统精神因素，能够使中国在 21 世纪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2009 年，贝氏出版了此生最后一部专著《孔子与儒学》（《Конфуций и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该书以作者多年对儒学的研究为基础，文字深入浅出，可供大部分读者接受，是世界上首部详细分析儒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精神及价值取向形成影响的著述。贝氏将儒学理解为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本，分析了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地位逐步提升的原因，故具有特殊的现实性意义。

5 结束语

贝氏是一位具有中国血统的俄罗斯儒学专家，从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到法家思想的深入挖掘，最后将重点放到儒家思想的阐释中，并认为儒家思想具有现实意义。贝氏选定中国众多文化现象中的儒家文化进行微观研究，我们认为其原因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他特殊的出身及学术背景；二是他希望将中国儒学的精华提供给俄罗斯；三是他试图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化贡献力量。贝氏在多年的儒学研究中充分运用了“翻译+汉学”的研究模式，这不仅继承了俄罗斯汉学界的学术传统，也是俄罗斯汉学发展的必经之路。贝氏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在俄罗斯掀起了一次新的“中国热”，他是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的专家以及通晓孔夫子思想遗产的优秀学者，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最权威的孔子研究者，他一生都踏踏实实地走在“找寻真正孔夫子”的路上。

附注

1 学界也曾将贝列罗莫夫译为佩列洛莫夫、别列洛莫夫、别列罗莫夫、彼列洛莫夫等。本文选取了国内首位介绍贝氏的学者李明滨教授在《莫斯科的孔夫子》一文中以及贝氏中国学生陈开科在《“莫斯科的孔夫子”——记俄罗斯科学院著名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一文中的译法——贝列罗莫夫。

2 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参考文献

[1]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Конфуций: жизнь, учение, судьба[М].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3.

[2]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Конфуций и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тилсервис”, 2009.

- [3]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Конфуций: Луной[M].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1998.
- [4]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Слово Конфуция[M]. Москва: ТПО «ФАБУЛА», 1992.
- [5]陈吉荣. 论“翻译+汉学”研究格局的渊源、内涵与影响因素[J]. 上海翻译, 2018(5).
- [6]陈开科. “莫斯科的孔夫子”——记俄罗斯科学院著名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J]. 孔子研究, 2000(3).
- [7]李明滨. 莫斯科的孔夫子[J]. 岱宗学刊(创刊号), 1997(1).
- [8]Н. Л. 玛玛耶娃. 俄罗斯汉学的基本方向及其问题[M]. 李志强 张冰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9]С. Л. 佩列罗莫夫 黄立良译. 儒学的核心价值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A]. 国际儒学联合会会议论文集(第一册)[C].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 [10]忻剑飞. 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十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3.
- [11]赵春梅. 瓦西里耶夫与中国[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 [12]张西平. 编后记: 海外汉学文献学亟待建立: 写在《西人论中国书目》出版之际[J]. 国际汉学, 2017(6).

"Searching for the Real Confucius"

—Confucian Studies by Russian Sinologist L. S. Perelomov

Xu Yan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Russian Sinology, L. S. Perelomov's Confucian studie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Known as the "Confucius of Moscow", he has published many Confucian monographs and the first scientific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Sinology. This article divides Perelomov's Confucian studies into three stages: the starting stage, the prosperity stage, and the maturity stage, analyzes the academic process of Perelomov's "searching for the real Confucius" at each stage, and focuses on the representative prosperity period as the research text to present the whole academic road of the Russian Confucian master.

Keywords: L. S. Perelomov; Confucian; Confucius; Russian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21 年黑龙江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的儒学研究”(编号: YLSCX2021-019HLJU) 及 2021 年度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翻译+汉学’模式下中国儒学典籍俄译研究——以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的《论语》俄译本为例”(项目号: WY2021074-C) 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许雁(1986—), 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2019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俄罗斯汉学。

收稿日期: 2021-05-13

[责任编辑: 靳铭吉]